

三十年集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 近视与远望

Thirty Years  
www.fudanpress.com.cn  
復旦大學出版社  
王曉明◎著





Thirty Years

# 近视与远望

王晓明◎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视与远望/王晓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8139-8

I. 近…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7687 号

**近视与远望**

王晓明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287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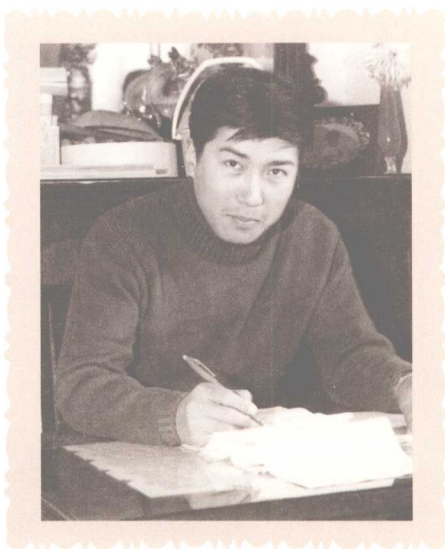
ISBN 978-7-309-08139-8/C · 208

定价: 3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九八一年春节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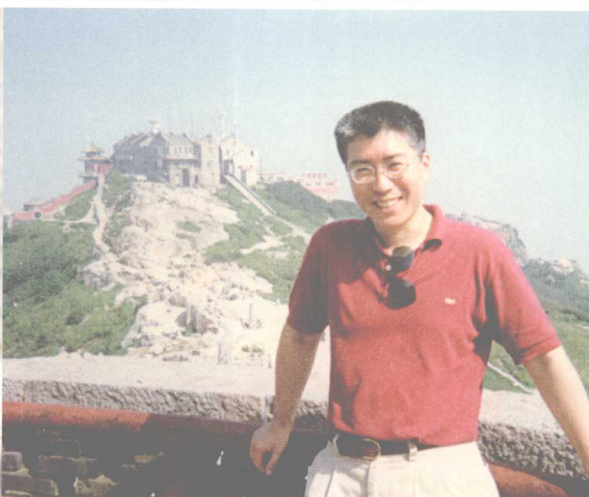
30

THIRTY YEARS / Wang Xiaoming

王晓明



1991 年香港



1999 年泰山

30

THIRTY YEARS / Wang Xiaoming

王晓明



1991年密执安大学

30

THIRTY YEARS / Wang Xiaoming

王晓明



2009年在东京




2010—2011年摄于天津梁启超故居右楼门口

30

THIRTY YEARS Wang Xiaoming

王晓明

## 自序



这是一本已经决定不编、最后却还是编出来了的书。

大约两年前吧，李辉兄来信约编此书，我就照他的指示，从旧文中每年选一篇，排出三十篇，可是，稍一细看这些文章，我却犹豫了。

其一，是形式上太乱。我早先的文章大多比较长，动辄一两万字，段落也分得粗，一长段一长段的，现在自己看着也累；最近十多年，却是短文写得多，有些甚至很短，千把字就煞尾了。长文大多比较“学术”，虽不喜欢引经据典，排列注释，行文总是很书面，绕来绕去的，一点不爽快；后来的短文在这方面有改进，多用大白话了，但论述的粗糙和浅直，也因此暴露得多。

选题更是芜杂：早先都是写文学评论，虽然字里行间，多有社会批判的意思，但大体还能止步于形式和心理分析的边界，并不直接冲出；后来就不同了，孔子、庄子、科索沃的轰炸、房地产的广告、城市空间、知识产权、鄂西山里人家的装修、孟买出租车司机的慨叹……我都评论起来了，而且越跑越野，好像刹不住车似的。

把这些篇幅、行文和选题都横七竖八的文章，硬排成一列，实在不好看。

其二，也更重要的，是内容上不齐。文章的好坏，其实和作者是不是一直盯着一个东西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你看得深，有定力，即便移动视线、变更话题，一样能表现思想的连贯。甚至可以说，唯其不断地触碰新问题，才炼得成真正牢固的连贯力，反过来一样，有了思想的连贯力，就是话题再杂，也能形散神聚，显出内容上的“齐”。

我恰恰在这一点上没做好。前面说了，这三十年，我是不断越界、越写越杂。我大致能感觉到社会巨变的症结所在，也明白“文化”——准确地说，是“新的支配性文化”——在这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此，我竭力追踪那些最能表现“支配性文化”之淫威的新事物，还不自量力，想掀开它们的恶俗的面板，看看底下躲着



什么秘密……这大方向是对的,但我能力不够,至少目前已经写出的文章,还远不能——哪怕是极粗略地——呈现一种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有穿透力的概观。“神”即聚不成,“形”就更显得散,把这么散乱的一团端出去?算了吧。

于是发电邮向李辉兄告罪,不编了。

大半年前,孙晶兄来了,快刀斩乱麻:“你还是得编!”她并举出一位北京老友的名字:“他也说你该编出来……”换个角度想,也对。这一套丛书,本来就是策划了来呈现我这年龄的一代人文学者的思想和学术历程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下坡路上走了不短的一段,除了少数之外,大概也都无力再转回上坡路,因此,这套书的真正的意义,是呈现历史:这些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是被怎样的地势和人事牵制着,形成了各自不同、而又大体相类的步速和走姿的,而非摆列成果:恕我直言,社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人文知识界有太多需要反省的地方,虽说大家都很努力,做了不少事,有的也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较深的印迹,但总体来说,与社会和历史的要求相比,还是不足道的。

这么想起来,我先前的犹豫,倒是过于自重了。好,编吧。

照顾到我的犹豫,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网开一面,允许我在体例上略违一点规。

首先是选文,我可以不必每一年都选,也可以一年选两篇,长文选得多了,篇数就可以减,虽说我公开发表学术文章的时间,已经超过三十年,但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只有二十五篇。

其次是目录,在按写作时间编年式排列的同时,我可以将目录一截为三,其间各空两行。用这个方法,标示我的学术写作的不同阶段:开始是兴兴头头,真理在握,接着却世界观破灭、四面彷徨,再后来重振心情、翻墙越界、又不自量力起来,区分虽然粗糙,我的散乱路线给予读者的可能的疑惑,总可以减少几分吧?

最后是文前的纪事。要求编者在各篇旧文前加写一段“纪事”,交代写作的前缘旁因,本是一个极好的主意,理当遵从的。只是我记性不好,时间又久了,许多事情都记得模模糊糊,去图书馆查吧,我人不在上海,不方便,而且——不好意思——也觉得没必要:现在这样局促匆忙的时代,本就难以培养对他人旧事的细致的兴趣,有些要紧的往事,又不能明白交代,与其继续含糊其辞,不如不说的好。

如此两面权衡,我就只写了极少几段纪事,分置在相关的旧文前面,其余的多数篇章,都任其光头了。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是经历使然吧,不大习惯四面矮墙的世界,总有一种远望的冲动。可我偏偏深度近视,十多岁就配眼镜了,鼻梁上深深两个坑。渴望看清地平线上的景致,实际却只能模模糊糊,这种梦想和实际的矛盾,陪我走了几十年。这一次重览旧作,我再次深切地体验到它。

但是,我以“近视与远望”为这选集的名字,主要却不在表示近视的无奈,而是相反,唯因近视,更需登高,远方的美丽景色,永远值得我们伸长了脖子,翘首以望!

2011年4月 屯门

#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八一

在时代的重压下——关于鲁迅性格的几个特点 / 2

一九八二

论《淘金记》 / 14

一九八四

论艾芜的三部长篇小说 / 25

一九八五

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 / 40

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 / 60

一九八七

谈概括 / 74

“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 79

一九八八

重写文学史 / 97

一九九〇

追问录(一至六) / 101

一九九一

历史追问录(十一至十五) / 114

一九九三

冬天的回忆——怀念艾芜和沙汀 / 127

一九九四

生命的分量 / 134

一九九五

太阳消失以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 / 137

一九九七

“人文精神”论争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困境 / 142

一九九八

半张脸的神话 / 151

二〇〇〇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 158

二〇〇三

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 178

二〇〇四

L县见闻 / 182

二〇〇六

篱笆里的河水——关于“文化竞争力”和城市发展的感想 / 198

从建筑到广告——最近十五年上海城市空间的变化 / 207

## 二〇〇八

在小道理的时代讲大道理 / 239

今日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从川陕甘地震谈起 / 242

## 二〇一〇

是推开门窗的时候了 / 258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 264

**附录一：学术小传 / 278**

**附录二：著(编)作单行本目录 / 283**

# 一九八一

## 纪事

1970年代末的华东师大，校园气氛已经相当活跃，教我们政治课的一位和善的老师，因为不得不照本宣科，招架不住学生的连串质问，竟在课堂上哭了起来。年近七十的党委书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集一次“77级”的学生代表（记得是每个年级一名代表，通常是班长）会议，他坐在长会议桌的上首，学生代表围着坐在第一排，校部的处长主任们坐后排。学生代表提出的问题，多能当场得到明确的处理，无人敢用“研究研究”之类的官腔，搪塞锋芒渐盛的学生。

中文系的教室在文史楼，一幢当时已有80年历史的老楼，我常在课间去楼下一层，看走廊上历史系“77级”学生的墙报。它有个醒目的标题：“新史学”，一大面墙上，密集地贴着500字一页的文稿纸，其中不乏直接挑战“历史唯物主义”的长文短论，令我暗暗佩服，觉得自己后知后觉。

1979年初秋，我在许杰和钱谷融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攻读现代文学的硕士课程。攻读者，读书也，每天早饭后，就一本一本地看，一段一段地记，却从没有想过写论文，更没有想到要发表。两位先生似乎也不鼓励。后来听吴福辉兄说，1978年秋，他们开始随王瑶先生读书的时候，甚至得到过明确的训诫：“你们就去图书馆里坐三年，一篇文章也不要写！”真是读书的好时光。

1981年初，我第一次——也是在别的两位老师的督促下——将读书笔记连缀成篇，投给了华东师大学报。在中文系一间光线暗淡的资料室里，学报编辑王光祖先生将几页清样交给我，仔细地教我校对之法。一眨眼，这已是整整30年前的事了。

## 在时代的重压下

### ——关于鲁迅性格的几个特点

#### 一

一个天才的特性,往往和他所处时代的特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越伟大,这种联系就越紧密。因此,要分析鲁迅是怎样一个天才,先得来看看他遭遇的是怎样一个时代。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陷于不断的危机之中。落后的自然经济日趋崩溃,社会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打进闭关自守的国门,封建统治阶级更没落到拱手卖国的境地。这些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恶果,像磐石一样压得中华民族喘不过气来。其中最沉重的,是鲁迅所说的“愚民专制”。它不但“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灯下漫笔》)更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种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将整个民族的精神能力窒息到不复自觉的程度。

严峻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要挽救中国于灭亡,非驱除封建黑暗不可。但在鲁迅生活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现实更严峻的另一面: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还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能像细菌那样在各种气候和肌体里繁殖、扩散,借着新形式一次又一次复苏。就在那些以各种方式挣扎、呼救、揭竿而起的人们中间,也存在着滋生新的封建意识的温床。封建专制并没有完全结束,封建主义还很有余裕地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继承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袁世凯们却想把龙袍再穿起来;至于别样的“皇帝”,更是绵绵不绝。苦难深重的中国大众,仍旧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

这就是鲁迅的时代。在他以前,是一连串革命的失败,一连串先驱者可歌可泣的悲剧。他自己也是一个先驱者,身后并没有旌旗蔽空的大队。他深懂得自己遭遇的是一个“可诅咒”的时代;他对中国历史又有着远非一般人所可企及的深刻认识,很知道历史负担的沉重。但他偏要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掀掉历史的重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鲁迅形成了自己性格的全部独特性。



也许正因为没能正确理解这些独特性,有些鲁迅的同时代人认为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显然是一种过于偏颇的看法,可以说是对鲁迅的严重歪曲。但一个时期以来,当批评这种错误的同时,有人又无视这些独特性,仿佛鲁迅是与悲观情绪完全绝缘的。这同样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想特别来谈谈鲁迅性格上的几个特点,它们不仅是黑暗时代投给这个伟大天才的沉重压力的反映,也是他最终战胜这种压力的结果。

## 二

首先是他那独特的爱。

人们一提到鲁迅的爱,总习惯于强调他如何爱护青年,如何重视人民,如何歌颂无产者,等等。其实,在很多场合,鲁迅实在更像一个愤世者。他脸上难得有笑容,笔下也绝少热烈的欢呼。从他那里,人们倒时时闻见不祥的警告和骇人的揭示。看看《阿Q正传》吧,那对“国人的魂灵”的近于残酷的剖析,简直令人不敢深思。至于“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送O.E.君携兰归国》)那样的诗句,更分明是愤世者的自白。

我们当然不应该把爱理解得过于抽象,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感情,而是为所爱者献身的强烈愿望和具体行动。因此,鲁迅的时代是对爱世者的一个非常严酷的考验。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带给人民的似乎就只是贫穷和屈辱,即使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是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黑暗封建势力的一次次卷土重来;群众则大都麻木、冷漠,甚至昏睡不醒。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面前,许多“爱世者”转过身去了:有些人的爱太脆弱,很快就被黑暗碾成了虚无主义,碾成了混世哲学;有些人长吁短叹,他们徒有怜悯,有同情,却感到无能为力;有的人热烈赞扬老百姓的忍受和耐性,其实却恰似鲁迅笔下的衍太太,冷酷而又虚伪;至于那些一见群众小有骚动即大声喝彩者,更不免令人怀疑他们的居心。即使原先真抱爱心的,也有些失了爱的勇气,因为在鲁迅的时代,爱绝不仅是赞美和抚慰,它更意味着自我超越和自我牺牲,意味着极度的憎恨和忘我的战斗。

鲁迅经受住了考验。正在这昏暗的时代里,他的爱闪射出耀眼的光芒。鲁迅本就是一个心灵炽热、感情强烈的人,对故乡、对民族、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是那样



深沉而执著,以至虽远在日本,“灵台无计逃神矢”,对故国的关怀和忧虑仍然占据着他的几乎全部心灵。少年时期“和许多农民相亲近”的经历,又使他直接感受到农民的善良淳朴,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因此能不断克服传统和阶级的偏见,真诚而深切地爱大众,自觉与他们共命运。

鲁迅的爱世,更因为他洞察这世界。虽也苦恼于革命的不断失败,他却从没有失去对中国的再生的信心。透过史书的涂饰,他很清楚地看到了历史因袭的可怕;但他更知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因此,他始终殷殷期望于劳苦大众,深知他们的愚昧是长期精神奴役的结果。他并且从下层人民的忍受当中,窥见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从阿 Q、闰土和祥林嫂们那些好像很可笑的举动中,看出其中隐含着的这种可贵的意义。随着对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辛亥革命失败的认识的逐步深化,鲁迅愈益相信人民的力量:唯有农民解除自身的精神枷锁,才能彻底铲除旧社会的根柢,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的一系列描写农民的小说,都表明了这一见解。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又从理论上增强了他的确信,他对人民的爱,也因此更深了一层。

能识才能爱。而越爱,鲁迅就越憎恨制造这现实的黑暗势力,急切地想改造这现实。他声言:自己的生存“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坟·题记》)他更借裴多菲的诗表白自己:“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正是这种爱,决定了鲁迅终生的生活态度。他必然疾恶如仇,成为黑暗社会的死敌,不管压迫多重,希望多渺茫,他都无法和它妥协。他也一定对阿 Q 们怒容满面,竭力抨击他们的愚昧,即使感觉孤独,陷入阴郁的情绪,也决不自我安慰。

### 三

在鲁迅身上,与这热切的爱几乎同样触目的,是孤独感。写于 1903 年的《自题小像》,就已渗透了这种孤独感;《野草》里那位“举起投枪”的战士,也分明反映